光辉历程

鞠躬尽瘁：邓颖超记录苏兆征遗嘱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八

在中央档案馆中，存有一份苏兆征同志的遗嘱。这份由邓颖超在苏兆征弥留之际匆匆记录的遗嘱中，从“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　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等寥寥数语可以看出，这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意识已模糊，仍念念不忘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

1929年2月25日晚，44岁的苏兆征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当天下午，邓小平和邓颖超等去医院看望病危的苏兆征，邓颖超记录了苏兆征的遗嘱，并交给党中央。邓小平在苏兆征病逝的第二天，在遗嘱右侧的空白处挥笔写下了一段注释，叙述苏兆征弥留时的情形：“这是小超记的”，“这是兆征临终时……说的。此时兆征同志的神志已极不清楚，且不能多说话了。就这几句话也是说得极不清楚而且极模糊的。兆征死于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二十分。”2月26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

苏兆征1885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岁时，由于在家乡无以为生，年轻的苏兆征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国轮船上当“侍仔”（即杂役）。多年的海上漂泊，使他不仅有机会耳闻目睹欧美各国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还经常接触正在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奔走的孙中山，从而加入同盟会，开始投身革命事业。在一次又一次率领海员们反抗工头粗暴对待的斗争中，苏兆征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而出色的工人运动领袖。

据史料记载，即使是在返乡居住的短暂时光里，苏兆征也不忘记向乡亲们介绍革命思潮，启发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压榨。这些活动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串通反动官府将苏兆征抓捕入狱。一年多的牢狱之灾并未使他退缩，反而促使他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离开家乡前，苏兆征怀着激动的心情到村外江树山脚下的“义士墓”前，掷碎了一个青碗，郑重发誓说：“我要继承先烈遗志，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此后为工人运动奔走的日子里，“鞠躬尽瘁”这四个字无疑是苏兆征革命生活的忠实写照。其子苏河清回忆说：“记得他在香港、广州、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总是早出晚归。他常在江边码头给工人们读报，讲革命道理，家中经常有伯伯、叔叔们来开会。为此，父亲多次遭到反动派的搜捕，但父亲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工作。”

1925年3月，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罪行，在他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领导下，香港和广州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由于深受工人拥戴，苏兆征被一致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罢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苏兆征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到商议罢工策略、筹措罢工经费，小到罢工工人的住宿穿衣、一粥一饭，乃至工人子弟的教育安置，他都亲自过问，耗尽心力。他时时嘱咐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安排好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只有工友们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情绪饱满，也就能够斗志旺盛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是这些事情办不好，反过来就会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使罢工斗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1927年5月，苏兆征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负责管理中央财务小组和全国总工会。1928年6月，苏兆征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28年8月，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苏兆征终于因为长期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因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休养至康复后再进行手术。然而，一心惦记着手中未完成的工作，苏兆征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抱病回国，1929年2月初返抵上海。苏兆征没有把病痛放在心上，一直夙兴夜寐，孜孜不倦。1929年2月20日，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结束后，苏兆征便一病不起。由于当时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不增加党的负担，他既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也不愿意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耽误了病情。

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回忆说：“春节过了五六天后，爸爸突然病倒了。爸爸没有告诉妈妈怎样去与党组织联系。妈妈手忙脚乱，无所依靠，又不懂上海话。爸爸病势越来越危急，妈妈只好在附近一间小医院找到一个床位，赶紧将爸爸送去。”

面对经过周折才知晓病情并赶来探望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人，已处于弥留之际的苏兆征仍牵挂着革命事业。他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大家说：“大家共同努力奋斗！”

在反复叮嘱同志们“大家同心合力起来　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后，苏兆征溘然长逝。长期负责罢工运动财政工作和党中央财务工作的他，却是身后萧条，以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的妻子儿女发出通告，号召“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应捐的数目，不定多少，只要是群众的志愿，本爱护领袖的热诚，一文一角，集腋成裘，当能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

苏兆征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胜利不懈奋斗的精神源泉。

文/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民族脊梁

谷文昌：

“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6月22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四有干部”的楷模、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的雕塑在中央党校落成揭幕。

当年，面对当地风沙肆虐，这位县委书记立下铮铮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他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将不毛之地变成郁郁葱葱的生态旅游海岛。

他“两袖清风来去”，离世35年，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海，共产党来干什么？”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湛蓝的天空下，点点帆船出没碧波间，细白的海滩上，游客们惬意享受美景。

然而就在60多年前，这里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风沙肆虐，民不聊生。时任东山县白埕村林业队长的林龙光老人说：“当时东山一年有150天以上刮6级以上大风，220平方公里的海岛，林木仅有147亩，30多公里的海岸线寸草不生。”

1950年，作为南下干部，谷文昌从老家河南来到东山，目睹当地群众艰苦的生活，他大声疾呼：“不把人民拯救出苦海，共产党来干什么？”

上世纪50年代，谷文昌带领东山干部群众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固沙、挑土压沙、筑堤防沙，种下几十万株苗木，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过了一段时间，树苗和泥土就被大风刮走，堤坝也被海潮冲垮。

面对困难，谷文昌立下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曾是谷文昌警卫员的潘进程告诉记者，为了摸清东山的地质、气候特点，谷文昌踏遍全县412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绘图；探访每个村子，详细了解地质特点、风沙出没规律等信息。

1957年，广东电白沿海种植木麻黄防风林带成功；在东山西山岩林场，一位老农随手种上的三棵木麻黄树苗在风吹沙压之下顽强成活；在白埕村飞沙滩，村民挖出了泥炭土，证明远古时代东山曾经有大片森林存在，东山可以种树！

谷文昌在白埕村安营扎寨，和林业队员们一道，种下了20亩木麻黄试验林，并在全县大规模推广种植。截至1959年底，全县共完成荒山造林4.3万亩，流动沙丘种草5000亩，筑堤18条，种树153万棵，成活率90%以上，80%的飞沙被固定下来。

在谷文昌看来，树和水是东山的命根子，防风抗沙取得成效后，他带领东山人民挖塘凿井，兴建了22座水库和705个大小水利工程，东山自此水美田丰，百姓不再受旱涝风沙之苦。

“两袖清风来去”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将这两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践行了一辈子。

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搞任何特殊，这是谷文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共同的评价。

谷文昌的通信员朱财茂、时任东山县委办干事的沈达成等人告诉记者：“谷书记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随身带着一把锄头、一个手电筒和水壶，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开座谈会，吃的是厚叶菜和地瓜梗熬的粥，睡的是地铺。”

时隔多年，谷文昌的小儿子、58岁的谷豫东对家里的饭桌仍然印象深刻。那是东山县政府宿舍院子里的一张露天石桌，大多数时候，石桌上的菜是地瓜和腌制的咸菜，半个月才能吃上半斤肉，“遇到下雨家里人只能端着碗在屋檐下吃饭。”谷豫东说。

朱财茂说：“谷书记公私分明，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牟利，他的5个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政声人去后　丰碑在民心

东山县政协原主席、东山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爱明告诉记者，东山人民对谷文昌有着深厚的感情，1981年谷文昌去世后，群众自发纪念、缅怀谷文昌的活动始终不断。1989年，谷文昌的骨灰葬在了当年风沙肆虐的东山县山口村赤山农场，每年清明前后，都有大批群众带着花篮、香烛等物品，自发祭拜谷文昌。

“时间越久越怀念谷书记。”东山陈城镇73岁老人陈志英告诉记者，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东山的旅游、海洋渔业越来越红火，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表示，谷文昌身上，有四方面精神特质弥足珍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大公无私的革命家风。

在高爱明看来，谷文昌的人格力量在于他作为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心中的唯一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一切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终在人民心中筑起了不朽的丰碑。

文/新华社记者　郑　良

（据新华社福州7月1日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老共产党员钱士湘——

尚思为国育英才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从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起，他始终如一，潜心教育，无私奉献，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对党的忠诚。

如今，这位82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仍然坚守在教育管理第一线。他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资深顾问、两届“感动北航人物”获得者钱士湘教授。

赤子情怀　大爱传承

钱士湘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之子。钱昌照先生一生关注教育、致力于振兴祖国教育事业和培养优秀人才。身为名门之后，钱士湘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1952年，他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批学子，1979年回到学校工作至今，全部心血贡献给北航。

1987年，钱昌照在北航设立了首个私人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父母过世后，钱士湘继承了遗志，捐献自己的部分工资并在亲友、以往的学生中募集经费，使这项在北航首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坚持了29年，共奖励了300余名学生。2015年，钱士湘与夫人杨宗智又捐资300万元，设立了“钱士湘杨宗智”奖励基金并充实“钱昌照沈性元”奖励基金，为北航教师和校友捐资助学作出新的表率。

“我80多岁了，只希望靠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学生们成才，让他们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钱士湘老人感慨地说。

曾获得“钱昌照沈性元”奖励基金的雒力旭，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外，更重要的是那份荣誉，极大地鼓励着我奋发向上的斗志，我为能获奖感到自豪。”雒力旭说。

“钱老先生一家对学校和学院的捐赠行为，值得后辈学习，是构建北航优秀捐赠文化的重要基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魏志敏表示。

晚霞夕照　培育英才

2002年，北航为创建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和教学改革试验基地，决定成立高等工程学院，校领导把筹建创办学院的重担交给了时年68岁的钱士湘。他不负众望，筹办仅两个月就开课了。

建院之初，他以资深顾问的身份，既要履行学院党政领导的职责，又兼管部分行政人员的业务。从办学宗旨的确立、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到选择、聘请讲课教师；从学生的选拔入学到日常学习、生活、思想管理，他都亲力亲为。

在钱士湘看来，个性化培养是很必要的。通过他的努力，学院为学生配备了一对一的院士、博导级导师，独具匠心地设计了学生们的课程，给学生提供了一片营养丰富的成长沃土。

钱士湘意识到“交叉出成果”的重要性，在为学生打下较好数理基础的同时，又开设了一些新课程，比如基础生命科学、中国哲学史等，这为高等工程学院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了一个指引性的路标。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钱士湘作为高等工程学院的创建元老，亲历了学院快速发展的全过程。目前，高等工程学院已培养了十余届学生，很多学生把他当成学校的“大家长”，亲切称呼他“钱老”或爷爷。

而今，已到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他热爱一生的教育事业上，继续参与学生的培养，探索高素质人才培育的规律，创新因材施教以及精英教育的模式。每天，在北航校园，总能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向主南五楼拾级而上的老者。

良师益友　真情至深

钱士湘和学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亲如家人。钱士湘常说，对学生要关爱、关心、关注。他的办公室全天向学生开放，学生经常找他探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向他倾诉矛盾、困惑，听他释疑解惑。

在创办高等工程学院前，他曾担任班主任，班里32名同学团结互助，学习风气浓郁，有23人考上研究生。他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课堂之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结成深厚的友情。十余年过去了，不少学生还和他保持联系，时而聚会畅谈。

钱士湘说，做人不仅要学好，更要记住，要身体力行去“济困解难”“关怀他人”和“回馈社会”，并将这些卓越品质和关爱扶助精神传承下去。他经常为困难学生提供帮助。当了解到有位学生因经济困难，平时伙食费十分节省时，就不定期地把这位学生带到自己家中改善伙食；当得知一位残疾新生上厕所有困难，他亲自到学生楼进行察看、调查，在其所住的学生公寓楼安装了坐便器。

“钱老的心里时刻都想着学生，只要是学生的事儿，他都会认真对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谨遵钱老的谆谆教诲，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2013级学生辅导员李艳茹说。

“年过八旬不自哀，尚思为国育英才。问君哪得健如许，桃李芬芳扑面来。”这是钱士湘老人的人生抒怀。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老共产党员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红旗飘飘

喔

记浙江省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章燕飞

湾底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一个美丽的村庄。

这里，路在树中，田在花中，碧波荡漾，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是宁波市民节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这里，一套套错落有致的多层住宅、连体别墅掩映在绿树花海之中，村民怡然自得。

这里，2015年销售总收入实现4.2亿元，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6.5亿元，是闻名全国的明星村。

吴祖楣是这个明星村的当家人。在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指引下，村党委书记吴祖楣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秉持“人民第一，创业万岁”的理念，走出了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发展的路子，昔日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变成今天人见人爱的“绿富美”。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现年71岁的吴祖楣只读过4年书，但因勤学肯干获得了村民的支持，从生产队副队长、党支部书记到党委书记，一干就是30多年。

改革开放后，当时的村党支部认真研究了“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这个课题，喊出了“创业万岁”的口号。如今在湾底村村口，这4个字刻在石碑上依然醒目。湾底的村集体企业从2家作坊式五金小厂起步，村干部和骨干党员四处跑业务，第二年就实现利润翻番，第四年实现产品首次出口。村里先后创办了天工工具公司等多家集体企业，产品扩大到20大类、100多个品种，远销海内外。1993年，湾底的集体企业一年的利润就超过了100万元。当时，吴祖楣既是村支部书记，又是厂长，还是供销员。

上世纪90年代，湾底村党组织从村里实际出发，坚持村集体控股的股份合作制，并引进了4家乡镇企业，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吴祖楣也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傻子”：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

“转制后，我可能富了，但湾底村集体经济可能就上不去了，更谈不上实现村民致富。”吴祖楣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30年来，我一直有个信念，一定要把湾底村发展好，让村民富裕起来”。

在工业中挖到第一桶金的湾底没有守“小摊子”，在做精做强的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农场的模式，将村民承包地集中起来，成立农业开发公司，搞种植业集约化经营，更多的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入村里的企业务工。

目前，湾底村已建成近700亩涵盖10大类50多个品种的精品水果种植基地，并形成花卉、蔬菜、果品3大农业及深加工产业，农户纷纷走上致富路。

打造“都市里的花园”

近年来，节假日出游渐热。湾底村地处宁波近郊，如何发挥区位优势，吸引人们走进来，心甘情愿地掏钱买门票，成为当时湾底村党组织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当时，很多人劝我们开发房地产，但我认为村集体的发展要稳字当头，生态旅游是一个方向。”吴祖楣说。将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与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他们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湾底村的第三次创业明确了开拓第三产业，特别是农业生态旅游的新思路。

2004年，湾底村成立了天宫庄园休闲旅游有限公司，做起农业旅游。村里先后投资1.2亿元建起了花卉基地，逐步打造出植物园、天宫城堡、非遗博物馆等一系列“近郊型”休闲项目，成为集农林观光、科普教育、乡村体验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都市里的花园”。

现在的天宫庄园“季季有果、月月有花、天天可摘”，大量游客蜂拥而来。数据显示，湾底村每年光门票收入就有2000多万元，上交村集体800万元。

从发展工业到“以工哺农”，再到大手笔发展第三产业，湾底村走出了一条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农旅一体化产业，被称为“中国乡村旅游的传奇”。

此后几年，湾底村先后获得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等称号。在吴祖楣看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湾底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为此，湾底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并提出了“保持近郊农村传统风貌和生活习俗、改善居住空间景观和环境质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居住环境”的建设目标，2011年被评为国家级生态村。随着旅游人数与日俱增，湾底村党组织也开始了新的规划——建设一个1.5万平方米的旅游集散中心。

“干部干部，干出来就是不一样。”湾底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党员干部。在吴祖楣的带领下，村党组织班子有两个坚持了30年的传统：党员干部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一人身兼数职，但只拿一份工资；坚持早上开早会、不定时开晚会。

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胡军说，湾底坚持走特色发展这一道路，坚持全民共享这一理念，实现了创业引领、绿色发展、和谐共享这一共赢局面。

采访中，湾底村民对《经济日报》记者说：湾底村这30年的变化，多亏了我们“老吴书记”这个带头人！

吴祖楣（中）在花卉大棚中。　（资料图片）